

论 苏 曼 殊

姜 东 赋

苏曼殊(1884—1918)在世上虽然只活了三十五岁,然而,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却占有一席比较特殊的地位。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的作品一版再版,许多青年,尤其是男女学生,喜欢他的小说,热衷于讨论他的思想和一生行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期。此后,随着时代的疾速进步,青年学生的思想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曼殊其人和他的小说就渐渐不被人提起了。去年,曼殊的小说集又被重新排印出版了,当读者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反应是很不相同的:多数年纪较轻的人,觉得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少数人感到惊喜。曼殊去世六十年,他的小说问世七十多年,这期间不到一个世纪,他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遭遇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建国以前,研究曼殊的有不少人。曼殊的朋友们(如柳亚子、章太炎、陈独秀等)不用说了,就是鲁迅先生和其他著名作家(如郁达夫),也都谈论过他。但是,建国以后,却几乎无人专门谈论过他。有时人们偶尔也提及他,但一般都是评论偏低:有的说他的小说“对辛亥革命后盛行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一定的影响”;有的甚至说他的小说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这样的评价不无根据,但是有失于笼统。它既没有顾及曼殊这位清末民初著名小说家的全貌,也没有对他的全部小说给予分析,指出其中的积极因素。本文有感于此,打算对曼殊其人和他的小说,作一点简单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曼 殊 其 人

曼殊原名苏戡,小名三郎,曼殊是他出家后的法号。作为一个诗人和小说作家,他以曼殊二字为人所知,原名倒很少有人知晓。关于他的身世的某些细节,他生前自己也没有弄清楚,柳亚子依据他的小说和其他散文,编写出他的传略,受到他人的批评,柳氏又据曼殊亲属传出的说法,对传略重加修订。但最后还是没有弄得水落石出。近年来,有人在《人物》杂志上说到他的身世,结果又引起别人的订正。总之,关于曼殊的身世,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了解得十分确切,只能道出一个大概。本文不想在这方面进行考证,只是鉴于他的不平常的家庭环境和遭遇,对他的性格、心理和思想,多有影响,因而在这里作点简要介绍。

曼殊的祖上是广东人,以经营进出口业起家,其父在日本横滨经营茶行。这就是说,这个家庭在中国属于早期资产阶级,并且是同外商打交道的,对西方的事情应该有较多的认识。然而,实际材料又表明,这个家庭的家长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它反对曼殊投身于当时在中国正轰轰烈烈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以致曼殊被迫辍学,只身流落上海,走入“自由职业者”——软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生只是靠翻译、写作和教书所得糊口。

曼殊的生母是日本人，是曼殊父亲在横滨所雇女佣。曼殊出生后，生母即辞工而去，后来不知所终。曼殊由义母河合氏（也是日本人）抚养。曼殊后来一直认为她就是自己的生母，一生中多次回日本探亲。曼殊在日本长到六岁才回到广东，进入中国的旧式学堂——乡塾读书，一直到十三岁，其时为1889—1896年，这也就是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那几年。这次战争，使中国社会激荡起来，资产阶级改革势力，从思想意识领域到政治领域，日见发展、壮大，上海、广东都是他们进行积极活动的地方。十三岁这一年，受了几年子云诗曰旧式教育的曼殊，随姑母来到上海，开始学习英文，并接受西方的知识。次年，他随表兄重到日本横滨，考入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其时，他父亲经营的茶行已经破产，父亲把河合氏留在日本，自己回到广东。曼殊此时生活完全靠亲友资助。他后来不仅在小说中，而且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对世态冷暖发出慨叹，这大概同他这一时期的生活际遇有关系。

从十四岁到十八岁，曼殊在日本读书，进一步接触到西洋近代的学术文化，并受到西洋文学艺术的熏陶。1902年，曼殊十九岁，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更进一步受到西洋文化的教育。十多年以后，曼殊在题为《谈剧》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早稻田大学期间，曾从坪内雄藏教授学莎士比亚戏剧，并观看坪内参加演出的《哈姆雷特》一剧。这个材料表明，曼殊在很年青的时候，就已经对欧洲近代文艺多有了解，此时，也正是曼殊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期。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向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势力空前活跃的时期。三年后（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的组织——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这标志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高潮。与此同时，进行维新变法失败了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也大批流亡到日本，梁启超就来到横滨。由于以上原因，当时的东京、横滨都是革命空气十分浓烈的地方，一些著名革命家如章太炎、陈独秀、章士钊等，都在这里进行活动。当时的革命报刊，也出版了多种，梁启超创办的专门小说期刊《新小说》，在横滨出版。从现有材料看，当时曼殊不仅与章太炎、陈独秀有交往，而且与梁启超有过从，并且在《新小说》杂志上留下了宝贵的谈文学的文字。由于生活这样的环境当中，曼殊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革命性质的青年会。1903年，曼殊又考入成城学校——一所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附此说明：鲁迅先生刚到日本时，也曾打算进入这所学校，后因故未成，由此，可见当时的革命气氛）。此时，沙俄侵占我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组织拒俄义勇军（不久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也曾加入。但是，他的行动遭到亲属的强烈反对，曼殊被迫归国。

在断绝经济供应的威胁下，曼殊没有屈服，而是来到上海，进入《国民日报》任翻译，开始过起笔墨生涯。同事中有陈独秀、章士钊；曼殊同陈独秀合作翻译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同时，曼殊还在苏州任英文教习，结识写小说、弄翻译的包天笑等人。此时，曼殊在报上发表《呜呼广东人》一文，此文痛斥洋奴的无耻行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文中说：“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为了什么呢？为了“我广东的细崽洋奴，独甲他省”，他们“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吊，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来欺凌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由此文可窥曼殊此时精神面貌之一角。

二十岁这一年，不仅是曼殊走上自由职业者——刚刚在中国形成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的开始，也是他一生发生另一重大转折的开始。这一年冬天，他突然在惠州的一座破庙里削发为僧！人们对此都感到不理解，曼殊当时也闪烁其词，弄得人更莫名其妙。更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曼殊出家之后，又“还俗”，所以人们称他是“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1904年，作为一个出家人，曼殊又来到香港《中国日报》社。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党的斗争日趋尖锐，曼殊的革命锐气不减当年，他站在革命、排满的立场上，痛斥康梁，并试图枪杀

康有为，后为友人劝阻。

也是在这一年，曼殊的生父病笃，托人捎信给曼殊，要他回乡探视。曼殊闻知后，不去探病。不久，其父病卒，曼殊闻耗后，不奔丧，不掉泪。这件事，透露出不少他们家庭失和的隐痛消息。曼殊一生中尽管语焉不详，但多次对朋友说自己“身世有难言之恫”，“家庭事不足为兄道，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近日心绪乱甚，太少两公又有龃龉之事，而少公举家迁怒于余，余现已迁出，漂泊无以为计……故只可沿门托钵”……这些材料都说明，他的出家为僧，与“家庭事”大有关系，实由“家”

（一个中国式的旧家庭）所逼而致。而曼殊之所以受不住这种逼迫，又与他的见识、他的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熏陶的精神境界有密切关系。一个已经有所觉醒、已经获得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等信念感染的知识分子，是受不了旧式封建家庭中的恶浊空气的；但是，他又是一个无立足境的软弱的书生，毫无对抗的能力和办法。于是，只好落荒而逃，躲入空门。但空门中并不是真正与世隔绝，一个已经觉醒的灵魂也不可能再变成死灰，于是，忧郁、悲苦就成了曼殊的性格特征和持续的心境。

1904年这一年，曼殊由上海启程，周游了暹罗、锡兰等地，学习梵文。一直到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他二十八岁，曼殊一直是云游四方，一边写诗作画翻译，一边在各地教书，足迹遍及长沙、上海、杭州、南京、芜湖、温州，乃至日本、印尼。他交游的朋友，多是当时风云一时的革命家。1909年，他参加了刚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为该团体的骨干诗人。

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曼殊正在南洋爪哇岛上一所中学任英文教师。他听到消息后，十分兴奋，急欲回国。他当时在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迺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谭；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他又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说：“‘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曼）如腊月病不为累，当北旋汉土，与（诸友）痛饮十日……”从曼殊的作品集中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一个短暂时期里，曼殊连连发表时论、杂文一类著作，写作颇勤，从内容中可以窥见他的欣喜心情和振奋的精神。曼殊回到上海以后，应《太平洋报》的聘请，主持笔政，与柳亚子同事。但是不久，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失掉了。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另组中华革命党。曼殊很快也由辛亥革命前对清廷的不满，变成对“革命”后新政府的痛恨。他把“民国三年”，故意在文章中写为“宣统六年”（实际上宣统皇帝在三年前就已经滚下宝座），他把袁世凯当总统的政权，称为“洋皇帝四年”，这都显示了他的义愤。在此期间，他同孙中山先生相往还，为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杂志》撰写稿件。对于袁世凯的作恶作孽、暗杀革命者的罪行，表示极大愤怒，在1914年以个人名义，发表《讨袁宣言》，声称：“衲（曼殊自谓）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1915年，袁世凯称帝，山东护国军振旅讨袁，曼殊听到消息，立即奔赴青岛，打算有所作为，但仅盘桓数日，便返回上海。

从1912年到1918年儿年间，曼殊先后发表六篇小说。1918年5月2日，曼殊病逝于上海。

曼殊去世以后，人们纷纷给以悼念，有人说他是一个浪漫诗人，中国的雪莱；有人说他是一个“鬼才”和“怪胎”；还有人戏称他是“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人们共同惋惜他过早逝世，钦佩他的才华和作品。

曼殊的一生确实是浪漫的、奇特的，它的最明显特征是思想、性格乃至心理中充满了矛盾。对于国事，他既有冲动一时的革命激情，又终于没有什么持续性的重大实际行动。对于

世事，既有比较清醒，比较深刻的认识，然而又终于听之任之，并没有什么改变不合理现实的积极活动。比如据说是曼殊手笔的一幅五言对联（悬于普陀普济寺）：“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人们用“魄力很大”四字来品评它。这幅对联，貌似平静，摆出一副与世无争，无心名利的超然姿态，而实为骂世之词。这幅对联一方面表现了曼殊对现实中名利之徒丑恶灵魂的深刻认识和痛恨，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世事的超然态度。对于家事，他既无限眷恋母亲，一生中多次赴日本探望河合氏，另一方面又对生父做得“无情无义”，从各种迹象上看，他是十分憎恶中国旧式封建家庭的。但每当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他又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隐痛不说，这也表现了他既有清醒的认识，又缺乏进行正面斗争勇气的矛盾心情。对于爱情，他实际上并没有绝情，他对青年女性有一种少有的敏感和观察，一生中曾多次尝过爱情的滋味，然而，他还是终生没有婚娶，而是当了一辈子和尚。他在《燕子龕随笔》中说，他的出家，并非绝情求道，而是“以情求道”，因而出家以后，心境常不平静，时时“多忧”。“以情求道”四字，又透露出他内心里多少矛盾冲突的消息！对于婚姻，他反对封建主义的门第观念和父母包办，主张婚前的接触和了解，要求家长在作出决定以前，先征求子女的意见。但是，同时他又强烈反对新式的“自由结婚”，把妇女应该遵守的礼法，看得十分重。所有这一切，都表示出曼殊思想中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他的主要心理特征——激烈和软弱，兴奋和忧郁，两种心境在短时间内交替出现。他好像是得了一种精神病，时时处处都抹不掉忧郁的色调。尽管他也有振奋一时的激情，也有冲动一时的意气，然而总的看来还是缺乏行动，一时的振奋之后是长久的忧郁，一时的冲动之后是镇日的悲观。

曼殊这种浪漫和奇特的性格，并不是什么怪胎和鬼才，而是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产儿，他是他所从属的那个特殊天地的产儿，他的独特的身世造成了他的独特的心理和性格。

曼殊生活的时代，无论是从全世界看，还是从东方来看，都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它的主要特征是新旧的冲突和交替。尤其是对于他的出生地日本，和他的祖国中国来说，更是处在一个由古代向近代发展演变的剧烈震荡时期。这期间，充满了尖锐、复杂、瞬息万变的矛盾斗争。新的势力抬起头来，旧的东西暂时后退，不久，旧的复辟，新的夭亡……这种现实不能不造成敏感如曼殊这样一种在社会中无立足境的知识分子的心神不定和忽冷忽热的心理特征。曼殊一生周游了许多国家，许多地方，这使他对世界大势，对世相，有一种比较开阔的透视，具备别人不具备的知识和眼光。再加上他从小就受到新式教育，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这更使他具有一种新头脑，成为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然而，他终归又是受过中国旧教育，出生在那样一个保守、落后家庭的青年，这使他从小又在思想中受到旧观念、旧礼法的毒害。这就是说，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家庭和所受的教育，都是有新有旧，又新又旧，处在新旧冲突和交替的状况之中。此外，再加上他个人的不幸身世，这一切，造成了他的充满矛盾又有忧郁色彩的性格和心理。

曼殊的性格特征是忧郁和悲观，有人说这是一种“世纪末”的没落感情。这恐怕不确。曼殊的忧郁不是垂死社会势力的绝望，而是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软弱知识青年，由于受到新风的吹拂而有所觉醒，产生了新的向往和追求，对旧的已经开始看不惯，但是又自觉软弱无力（因为他也确实先天不足），缺少实现追求和向往的勇力和自信，于是只好自己苦恼自己，变成一个忧郁的人，悲观的人。这就是说，曼殊并不是因为旧的行将就木，而感到绝望，而是看到新的希望无力、也无法实现，因而感到悲观与软弱，这当中充满自怨自艾，而缺乏愤怒和力量。所以说，曼殊的忧郁是表示着新的已经诞生，但尚属幼弱的一种苦恼，是新的被旧的压迫着，担心被旧的吞噬时的那种悲哀。曼殊自称他“以情求道”，还说自己是“有愁无命（运）”之人，这话都表示他内心有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无法实现，但又不甘心去依附于旧的，于是只好落荒而逃，这才出家当了和尚。

然而，忧郁和悲观总不是新生事物应有的特征，这就又要到产生于古老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软弱的性格上去寻找原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旧的社会力量难分难舍，他又诞生在一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新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时候，他睁开眼去看西方，西方也并不十分美好，他回头看看中国，中国更不象样子。前途何在？实在渺茫。这种阶级心理完全可以从曼殊的作品中体会出来。曼殊的软弱和悲观，只不过是这个阶级心理的一种折射而已。

曼殊式的性格，在相类似的时代的其它民族中也产生过。比如，较曼殊的时代早整整一个世纪的十九世纪初叶的俄国，当时在贵族知识青年中产生过“多余的人”。这时的俄国也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一些受到西欧文明熏陶的贵族青年，不满于农奴制的旧秩序。他们既是欧洲思想的孩子，又是俄国农奴制生活条件的产物。这种矛盾的环境把他们造成一种“聪明的废物”。他们“聪明”，了解西方世界的情况，对俄国现实有比较清醒和正确的认识。但是，他们又终于无所作为，因为他们远离人民，又怕吃苦，所以实际上还是个“废物”。在别人看来，他们是于世无补的“多余的人”。在他们自己，却深味忧郁的苦果，内心充满苦闷。曼殊的思想、性格，同俄国的“多余的人”有些相似，当然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仅仅从他们相似这一点来说，也无妨把曼殊称为二十世纪初叶，出现于世界东方文明古国的一个“多余的人”。他既是西方先进思想的孩子，又是中国这块土地的产物。人称他是“出家的革命和尚”，正如同在这几个字中间，“出家”和“和尚”是“革命”的两倍一样，曼殊终究还是一个废物，是一个没有找到归宿，看不到人民力量，也没有被人民发现的孤独者，尽管他的心灵受到过西风的吹拂，闪现过革命的火花。总而言之，曼殊是软弱的早期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人物，他反映了这种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他的特殊性，则完全是他的独特的不幸的个人身世造成的。

二、曼殊的文学思想

曼殊生活的晚清，正是中国文学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原因如同上述，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学思想上，中国固有的理论面临回答新问题的局面，从西方传来的新理论，面前摆着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学及其下一步如何发展的研究课题。在这个短暂（大约不到二十年）时间里，人们提出了许多文学问题和文学改革口号，就中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在这方面的影响和贡献最大。在这一片热烈的讨论文学问题的争辩声中，曼殊虽然仅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却道出别人没有道出的道理，纠正了前辈著名人物的偏颇，今天看来难能可贵。

前已述及，1902年，梁启超在流亡地日本横滨创办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专门小说杂志——《新小说》。该刊创刊号揭载了梁氏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它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在乎中国旧小说内容中充满秽质和毒性；因而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小说理论。这一理论以其充沛的爱国热情，犀利的言词，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随声附和者所在多有。但是，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说却是头脚倒置的，热情是可贵的，理论却是偏激的。

在对这一小说新理论一片喝彩声中，年仅二十岁的曼殊，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且大胆地把自己的意见送到《新小说》杂志发表。曼殊质问道：“今之痛祖国社会（引者按：即梁氏所谓“群治”）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这一问单刀直入，提出了小说与社会现实关系究竟如何的根本问题，抓住了梁氏理论的要害。

曼殊认为,“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中国旧小说中所包含的秽质与毒性(诸如受到梁氏痛斥的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妖巫鬼狐思想等等),正是中国社会本身腐败的反映,而不是相反。“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因此,欲改良中国社会,必须先从改良社会本身做起,而不能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改良小说。从政治上来说,曼殊此一认识,指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启蒙主义的片面性。曼殊举例说,我们中国国民素来文弱,因此妇人眼里之美男儿,必然是“面如冠玉,唇若涂脂”的书生。而德国国民尚武,所以其妇人眼中之美男儿,都是“须发蒙茸,金钮闪烁”(曼殊注:“金钮者,乃军人之服式也”)的武人。民族的强弱,习尚不同,这反映到小说当中,中西美男儿的形象自然也就根本不同。这就是物与影的关系。明乎此,则要改良中国民族的素质必须从根本处着手,而不能只是一味指责中国的旧小说。

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说:“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海盜、海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这种显然偏激的意见,在当时也曾被许多人接受,几乎成为一种关于中国小说史的定评。对此,曼殊也大胆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他认为,中国的说部书(包括小说、戏曲、弹词等)中有不少优秀之作,比如《西厢记》,它完全可以与西洋戏剧作品相媲美。曼殊还推崇《红楼梦》和《水浒传》。他还以《金瓶梅》为例,指出:“此(书)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然而,“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写淫之处,此外则随手披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若其回目与题词,真佳绝矣。”在晚清那个时代,曼殊能独具只眼,对《金瓶梅》能道他人之所不能道,指出它的价值在于是一部“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意即通过它,可以对产生它的社会原状有所体察,这种意见,当然是曼殊那个“小说乃民族之调查录”观点的实际运用,即在今天看来,仍然中肯。曼殊对《金瓶梅》的全新评价,早已引起国内研究这部小说的学者的注意,于此也可见曼殊的眼力超人。

曼殊认为,从根本上说,是现实决定了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小说内容造成了社会的腐败,这当然是正确的看法,他纠正了当时风靡一时的小说理论的偏颇。然而,这并不是说,曼殊否认小说可以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反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曼殊则是完全赞同梁启超的观点的。他在《谈剧》一文中认为,排演新戏(按指早期话剧)应该抱定于世道人心有补,“导世诱民”之本旨,要肩负起“社会教育”之重任,而不要只满足于追求新奇布景和服装。在实际文学活动中,曼殊以文学为精神武器,为当时的实际运动服务。他译介了拜伦的诗,在《燕子龕随笔》、《岭海幽光录》中,着意搜集明末抗清遗民的诗文,以之为宣传排满、革命之助。

说到曼殊的文学思想,这里不能不指出它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倾心于浪漫主义。鲁迅先生在《坟·杂忆》一文中回顾了清末的情况,说:“其实,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另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由于曼殊当时的心与为民族、民主革命而奋斗的志士们相通,所以自然对叫喊复仇和反抗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格外推崇。这种文学思想,当时在南社诗人中有代表性,它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曼殊的《与高天梅论文学书》中。

受信人高天梅即高旭（1877—1925），南社的积极发起人之一。曼殊给他的这封论文学的书信，原载1910年冬天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三集中，写于同年旧历五月初，当时曼殊正在南洋。他在信中说：

“衲（曼殊自谓）尝谓拜仑足以贯灵均（屈原）、太白（李白），师梨（今译雪莱）足以合义山（李商隐）、长吉（李贺）；而莎士比（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孙（今译丁尼生或但尼生，英国十九世纪桂冠诗人），以及美之郎弗劳（今译朗弗罗，十九世纪美国诗人）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

曼殊对中国的李、杜，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评价是否得当，另作别论。这里只想说一点，即：曼殊为什么对包括中国的屈原、李白、李商隐、李贺，和英国的拜仑、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持高度赞赏的态度，而对包括中国的大诗人杜甫和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内的几位诗人，却持贬抑的态度？

这个问题，可以从这封信中找到答案。曼殊称他所推崇的那些诗人为“灵界诗翁”，称他所贬抑的那些诗人为“国家诗人”。对于前者，他欣赏他们的创作态度是“专为苍生者”，欣赏他们的作品是“至性之作”；对于后者，他认为他们是“颂其君”者，是“宗室诗匠”。这里先不管这种评价对他所指的那些诗人是否合适，这种看法表明，从政治上曼殊赞赏那些“叫喊复仇和反抗”的诗人，从艺术上曼殊主张诗要表现诗人的性灵。这正是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这种主张在清末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为时代中的进步势力服务的，因此应该给以较高的历史评价。

总起来说，曼殊的文学思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是进步的，其中有不少地方是高出他的同时代人、甚至前辈的，某些地方，在今天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三、曼殊的小说

著名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说过：“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曼殊的小说，首先向我们揭示了他自己的灵魂。因此，研究他的小说，可以使我们对曼殊其人有更深的了解。

曼殊一共留下六篇文言小说，其中的《断鸿零雁记》发表于1912年，最为著名，共二十七章，约三万四千字，大体上具备了长篇的规模。此后发表的《绛纱记》和《焚剑记》，各约一万字。以上三篇，主题相近。《碎簪记》和《非梦记》，主题基本相同，都较短。《天涯红泪记》看来是类似《断鸿零雁记》的另一个长篇，它只有两章，没有写完。从现存的两章内容看，它反映的生活面可能比较开阔，可惜未能写成。

曼殊的小说全都是爱情篇什，也全都是悲剧。它们的头一个共同特征是充满一股悲凉的气氛，一股对事情莫可如何，尽管心中痛不欲生，然而也只好听天由命，不了了之的情绪，有些地方好像是故意拨弄流血的伤口，故意让读者去体会一种莫名的痛楚。它们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往往不是人间实有的社会生活，而是一种特意虚构的画境。这种画境，有的从背面表现了曼殊对现实恶浊环境的厌恶，比如《绛纱记》中写小说主人公在海上遇难后漂流到一个世外渔村，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女自立，不读书，不识字，但知敬老怀幼，孝悌力田而已”，从来不闻“评议是非之声”，俨然是一个和平、劳动的仙境。这种描写当然属于浪漫主义，它表现了曼殊对现实的不满，然而它又是虚无缥缈的，证明它的虚构者既不懂得社会，也看不到真正的出路，只是不满和软弱无力地向往而已。而另外有些虚构的环境，则只是为了宣泄作者的感情，也即是所谓“景语皆情语”。还有，小说中人

物的关系和行为,也往往不符合现实生活固有逻辑,而显出是生编硬凑的痕迹。曼殊小说的第三个共同特征是:在爱情故事之间,游离于主要情节之外,作者时时插入一些讽刺现实的说教。《断鸿零雁记》中插入对于朱舜水事迹的叙述,借机鼓吹排满宗旨。在第二十一章,作者居然用整个一章的篇幅,完全游离在故事情节之外(只是借主人公一次“偶然看见”这样几个字,把它放到作品之中),插入七首打油诗,讽刺清末民初的腐败政治和社会恶习。这种插入式的写法,一方面由此可见曼殊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可见曼殊对中国传统小说写法的某些因袭。但总的说来,这种写法显示了当时小说技法上的幼稚。曼殊在小说中用议论来直接论证、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做法,用今天流行的新名词来称呼,正是一种“席勒式”的方法。这种方法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本来也是有不解之缘的。

曼殊的小说尽管有以上共同特征,但各篇表现出的思想意义,还是有区别的。《断鸿零雁记》、《绛纱记》和《焚剑记》三篇,主题相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碎簪记》和《非梦记》,则基本上是消极的。

《断鸿零雁记》原先有人认为它是曼殊的自传,并据以编写他的年谱;建国以后,有的文学史著作仍然说它是“写作者的飘零身世”,这些看法从常识上看,都是不对的。说它是含有自传成份的小说,庶几接近事实。这篇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歌颂了女主人公雪梅对待爱情的坚贞态度,她宁死不向封建家长屈服,最后殉情而死。小说在歌颂这种忠于爱情的高尚品德的同时,鞭挞了封建势力,他们以女儿为货物,高价而沽,根本不尊重女权,只看重钱财。这篇小说的消极因素在于充满哀怨、悲观,男主人公十分软弱,好象除了死、逃跑或出家以外,在恶势力面前别无对付办法。因而,这篇小说尽管能够激起不少青年读者的同情之心,哀愁之情,却不能鼓舞他们的斗志。男主人公三郎,如同一只孤鸿,心中充满低徊难排的悲愁和矛盾。他时有清醒的意识和强烈的爱憎,然而,他又觉得势单力薄,看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于是只好托身空门,在苦难面前闭起眼睛。但他又不甘心,还时时回首看望、体察一番。对于爱情,他并不是心如枯井,但始终恭慎自守,不敢有什么主动的表示。这个形象的精神面貌中,显然有曼殊个人的思想感情在内。他是一个无力者的形象。

《绛纱记》写四对男女青年的恋爱悲剧,主题大致与前一篇相同。这篇小说写梦珠与秋云的婚姻悲剧,写了“巨绅”为了夺取秋云,对其家进行政治陷害,买通官府,逼死其父。秋云在恶势力面前,始终顽强不屈,忠于对梦珠的爱情。小说在写县鸾与五姑的恋爱悲剧时,反映了当时南洋华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华侨在新加坡投资经营糖厂,厂中的重要职务却都属于英国人,因而主要权力操于外人之手,而他们又居心叵测,华侨投资者简直势如累卵。小说写到这个细节,表现了曼殊对世事的关怀和忧虑。小说中写了五姑的父亲谋财害命,毁弃婚约,五姑却忠于爱情,不避路途险恶,寻找失散的爱人,最后病故。这些内容,都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也是那种只知悲苦而无行动的软弱书生,最后不是听凭命运的摆布,就是出家逃入空门。小说在写了以上作者认为属于“情之正者”的爱情故事之外,还写了罗霏玉与卢氏姑娘的纠葛,二人在冷饮店里邂逅相遇,便眉来眼去,遽然订交。后来女方骗走三千元巨款,却暗中与一绸缎庄主“自由结婚”。罗霏玉发现后,当天自杀。曼殊攻击这种女性无贞操,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内容。

《碎簪记》和《非梦记》都是写三角恋爱故事的,它们宣扬“世人梦中,悠然自得真趣;若在日间,海阔天空,都无意味也”的色空观念,劝说人们不要“为情所累”,大有看破红尘之概,主人公不是自杀,就是祝发为僧,消极思想占主要地位。

总之,曼殊小说中的人物身心,有曼殊的影子,通过它们,可以对曼殊的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它们中的一些篇章,也含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今天不妨把它们作为一种历史陈迹,有批判地介绍给新一代青年,让他们从中认识那个早已过去了的时代中的某些现象。